

新周刊
NEW WEEKLY

世界观

2012

《新周刊》主编

白岩松

何兆武

马悦然

陆谷孙

李敖

罗大佑

林兆华

哈金

吴念真

蔡澜

郑渊洁

温铁军

何慧丽

刘小东

张永和

韩松

杨炼

谷川俊太郎

左小祖咒

李屏宾

戴大洪

海桑

金宰贤

雷克

黄西

金星

影子

鲍鲸鲸

赵蕊蕊

申音

刘新惠

吴莫愁

文匯出版社

世界观

2012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观2012/《新周刊》主编.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96-0778-5

I. ①世… II. ①新… III. ①世界观—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5622号

世界观2012

编 著 者/《新周刊》

出 版 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刘 刚

特约编辑/谭山山 刘 瑛

封面设计/万得福

版式设计/黄 东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60千

印 张/8.75

印 数/1-10000

书 号/ISBN 978-7-5496-0778-5

定 价/27.00元

了解这个世界

美国作家霍桑说：“在这个神秘世界表面的混乱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被十分恰当地置于一套体系里，体系之间，他们各自与整体之间，也都各得其所。一个人只要离开自己的位置一步，哪怕一刹那，就会面临永恒失去自己的危险。”

这一大段话，可以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话概括，那就是：永远不要迷失自己。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瞬间，在某个热天午后，或是冬季深夜，你忽然找不到自己了，你发现自己成为了某种社会机器，从现在到死亡的每一天都可以预测。你发现自己的快乐和发愁，都是如此的平庸。你发现自己成为了小时候发誓“绝不成为”的人。你发现自己现在陷在生活的污泥里，你发现你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你发现自己失去了对他人的想象。

《新周刊》的“世界观”栏目持续了几年，采访各行各业杰出的人，他们有的德高望重，有的红极一时。如果说这个栏目的坚持有什么精神内核的话，那就是保持着对他人世界的好奇。

在“世界观”里看他人谈论自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有趣之一，在于无论多么成功的人，比起快乐，都更愿意分享他们的烦恼和孤独。有趣之二，在于他们人生的差异。

90后的当红“炸子鸡”吴莫愁还在享受着被消费、被娱乐、被热闹的快乐，73岁的翻译家陆谷孙已经在说：“现在采访、演讲尽量都推掉，我只想 leave me alone（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实在对外面的事情很绝望了……想赶快度过余生。”

同一个世界，如此不同的世界观。每个人的世界观都像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星系，拼凑起来，才可见浩瀚银河系的部分图景。

想要了解这个嘈杂的时代，必先从了解人开始。

人多么容易只顾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陷入生活的泥泞。要摆脱它，必须与世界建立某种精神联系。或许读这本书，就是一个开端。

《新周刊》副主编 蒋方舟

目 录

序：了解这个世界

白岩松：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已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002

何兆武：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016

马悦然：很多作家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了028

陆谷孙：身在丝绒樊笼，心有精神家园036

李敖：能把一介文人表演成这样，这是我最了不起的地方 .048

罗大佑：时代待我们不薄056

林兆华：我不是先锋，而是被先锋062

哈金：艺术才是作家真正的护照068

吴念真：每样东西都有可能是严酷人生的养分076

蔡澜：健康版害死很多女人，又间接害死很多男人084

郑渊洁：最厉害的孩子是一手拿着我的书，一手上最好的学 .090

温铁军：农村需要城镇化而非城市化	098
何慧丽：社会实践上的事，跟写文章不一样	106
刘小东：艺术家是最大的头衔，它是自由的象征	116
张永和：我盖房子，做首饰，做衣服，都是因为喜欢	128
韩松：科幻就是要描写人类的乌托邦	136
杨炼：当先锋容易，当“后锋”很难	144
谷川俊太郎：我是一个写诗的手艺人	152
左小祖咒：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爸爸	160
李屏宾：摄影师是很被动的	168
戴大洪：我不愿意跟这个浮躁喧嚣的社会说话	176
海桑：粮食和棉被更重要，然后才是诗歌	184
金宰贤：不要阻止我们说“不”	192
雷克：我就是喜欢在路上	200
黄西：真正的强者敢于自嘲	208
金星：面对上天的额外奖赏，我没有受宠若惊	214
影子：我不是随波逐流的女人	222
鲍鲸鲸：我以后是要做家庭主妇的	230
赵蕊蕊：我不想要铁饭碗，我想要一双翅膀	238
申音：创业就是自虐	246
刘新惠：我可以聊艺术，但别跟我谈生意	254
吴莫愁：不坚持自己，只会让爱你的人无奈	262

世界观比世界大。



白岩松：做无用的事，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更安静

生于1968年。1985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1989年分配至《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后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至今。

任何一个人，大家有时候总会问：“哪一个他才更真实？”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做每一件事情展现出来的那一瞬间，都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见过很多温文尔雅的人在球场上突然成为“暴力分子”，哪一个是真的？可是我非常清楚，都是真实的。我的球友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生活中和声细语的，但是在球场上偏偏很暴戾。

屏幕上的我跟生活中的我其实是一个人。我觉得大家在解读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过简单了，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很

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看任何事情，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白就是黑、不是 A 就是 B，但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更多是在 AB 之间、在黑白之间、在对错之间、在好坏之间，那才是最大的比例。所以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不会简单地下结论。人也是一样，我们会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别逗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任何人都一样，就看环境激活了我们什么。

有的时候跟大学生交流，我就想，我也有可能成为他们所厌恶的人，如果环境把你潜在的那个因子激活出来，一样。

当每一个人都都在拉扯你去做很多他们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活着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我认为都处在一种“没有时间活着”的状态。我毕竟过了 40 岁了，也要去考虑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不是全是那些“有用”的事情？为什么在做那些大家都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我一般感觉不到快乐？

我做新闻的时候，也不一定感觉快乐，因为这是责任，是你的理想的某些东西在这里。因此，生命需要一种平衡。过了 40 岁，就越来越意识到，我不能总去做我自己认为——尤其是其他人认为的——那么多有用的事儿吧，那些我经常觉得

快乐、无用的事儿怎么没有时间去做呢？所以，在暗合自己或者说是契合自己的一种状态当中，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发生在我身上的冲突绝不仅仅停留在我这儿，它也是时代的一种病。所以，大家会觉得契合，但我必须得承认，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要去为大家怎么怎么地——那又是“有用”的事儿了，我只不过是发布自己的感慨。但我也是时代当中的一分子，这是时代病，我也是被传染的。那么大家有那样一种共鸣也是正常的。

我现在必须是要敢于说“不”。具体说来是有步骤的：2003年我放弃了权力之路，辞去了所有附在我身上的——当时我是三个节目的制片人——与权力有关的路。那好了，我堵死了一个出口，这是一条岔路。如果你眼前有无数条岔路，那你会把自己走晕了的，现在我先把它堵死了。

接下来的就是所谓利益，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清洁，有时候亲朋好友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确实推不掉，有时候也会去做，但是必须坦白说大部分钱我已经不去挣了，大家很少会在类似企业、商业或是演出的各种场合看到我。

还有一点很重要——堵死了一条“好好先生”之路。人有的时候完全没有时间了——都在做“有用”的事，没有时间去做“无用”的事情，有一点便是因为你试图维系着这种好好先生的面孔，面向所有的方向，你不会发火、

不会说“不”，你好像没有得罪任何人，最后却把自己“得罪”了。

堵住了权力的路，适当地堵住一定比例的钱的路，再堵住一些好好先生的路——便给自己腾出了一些空间，腾出了一些空间就可以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儿了——听听音乐，看一些书，跟朋友聊聊天，保证一定的运动量，踢球，散步，去画画北京的美食地图，或是找找淘碟的地方。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不再愿意用时间去换利益，我拿出相当的时间去换取自己的舒服，换取生命该有的某种状态。

我18岁到20多岁之间做无用的事是做得最多的，我现在不过是一种回归而已。你说半夜趴在床上写诗有什么用？对着星空数星星有什么用？一帮男男女女坐在草坪上弹着吉他，然后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一遍，有什么用？为一个民族深深地忧虑，热烈争吵，在很多成熟的人看来，这有什么用？

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幸运吧，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做过很多所谓热血沸腾的无用的事，所以才有了深深地做“无用之事”的这种“种子”。

在我打拼得最狠的那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也会有意识地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只不过不像现在这样越来越多。

那个时候，我经常会把以前的球友召集在一起打一夜麻将，你说这有什么用呢？说赢了钱吗，没有，一般是输钱的。听音乐有什么用，也会去听啊，只是比例会小点。很重要的一点，那个时候要是没有在看一些无用的书，便没有后来的“悟”——比如说我最初做《东方之子》的时候，陪着我的是曾国藩的书。曾国藩有一天一下子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的《东方之子》跟他是同步的。

真正若是说“开悟”，那有很多种类的开悟，但若是讲人生的某种开悟，的确来自我看到曾国藩写到——曾国藩一生中的最高境界，达到了巅峰，是陪着皇帝吃了一顿饭——当我看到这一段的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他妈不喜欢”，如果这就是人生的最高峰的话，我不要！

那是在一个下午，我突然明白有一些东西是我不想要的，我不看重它。这是一个重要的“悟”。

我既欣赏曾国藩的某些东西也很可怜他。这就是曾国藩给我的东西，它不是单向的，是复杂的。这里边还有很多的钦佩，能理解他的某种挣扎，但是又有某些不屑，都纠缠在一起。像一面镜子一样去照，那我觉得就是“悟”。我那时候真的很忙，天天在忙、四处出差，一个月最多做过17集《东方之子》，忙得一塌糊涂，但只要是有时间，我就一页一页地翻看曾国藩。如果没有这种无用的事，我会有那一瞬间

的“破壳”吗？我觉得这种破壳经常是发生在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面对社会的时候，你应该多关心很多跟自己无关的事，你要把自己从老百姓慢慢地向公民过渡，这是中国必经之路，每一个人最好参与其中。“无用”底下的两个子题——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对外要关心很多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对内要多做很多别人认为没用的事儿。可能谈到做无用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想到“内观”，但是作为一个新闻人我也很看重“外观”。如果不关心很多与自己无关的事，那么有一天你会成为牺牲品，就这么简单。所以，它还是有用嘛。这里头有一个辩证法，你看似关心了很多与自己无关的事，其实也是在关注自己。

比如说对外，我们都在抱怨别人，但是有没有想到你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现在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我们天天在骂染色馒头、三聚氰胺之类的，可是回归到每一个行业里头，你不也在往这行业里掺很多东西吗？你我都是干新闻的，你敢打保票你没掺过“三聚氰胺”、没染过色吗？

我们有权利成为原告，因为买了掺染色剂的馒头、掺三聚氰胺的奶粉，你很愤怒，这伤害了孩子、家人，可是我们

有没有想想,从我们手中出来的某种产品也掺了,那别人的感受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原告,但同时也是被告。那就要多关心很多与自己无关的事,成为一个公民,约束自己也约束别人。

1993年,我在上海采访过哲学家赵鑫珊。我问他,为什么科技进步得这样快,但是现代人还要靠十八九世纪的音乐来抚慰心灵?赵鑫珊回答说: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句话我会记一辈子。

我们进步了,手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它带来了方便,但它带来了幸福吗?我们现在说,楼越来越高了,可是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高楼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这些反而导致了城市温度的上涨。我们过于简单地把这些东西理解为进步,从某种角度讲,我觉得它是退步。没办法,人太多没土地了,所以楼越来越高。通讯也是,过年人们都不当面拜年了;手机里头500多个甚至上千个电话号码,但是关键时候有几个可以打?人们现在接名片,拿了名片先看是什么位置的人、有没有用,没用的就撕了。我们只愿意结识“有用”的人,最后生活中有趣的人就越来越少。

而无用往往是跟有趣联系在一起的。会喝茶的人有几个?会听音乐的人有几个?附庸风雅者居多。喝酒也是,酒

我既讨厌又喜欢，讨厌的是那些为了应酬的酒，喜欢的是完全没有利益纠葛，哥儿几个往那一坐然后瞎喝，这才是好酒。

大家经常说“进步了”、“现代”，我现在特别警惕“现代”这个词，“现代”指的是一种时代，并不意味着牛逼，可是我们现在把“现代”当成了牛逼。现代人会像古代人活得那样精致吗？比如说，我不认为现代的家具超过了明式家具。当然我没有一件明式家具，但以我有限的审美，真正震撼了我的就是明式家具，我没见过比那再牛的了，它就是艺术品，简直是绝了。古人为什么能够有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做无用的事的时间。

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伟大的创造，都来自无用的时间和事情当中。牛顿要没在那儿闲待着——这个未经考证，不一定真被苹果砸的，但是在大家的构想当中，他是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儿然后被砸中；再比如说，马克思琢磨什么什么主义，在那时候绝对是无用的；还有像苏格拉底他们，不纯属一帮闲汉吗？但人类和历史的被推动不经常是由这些闲汉造成的吗？

2012年年初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浙江富阳。富阳现在以《富春山居图》名扬海内外，但是当初，600年前的时候，一个72岁的老人——黄公望，在那儿画了一幅很无用的画，用了三四年。当时能山居，他一定是远离中心，也是个无用